

# 喜新戀舊： 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

吳奇浩\*\*

## 摘 要

本文以日記性質的史料為中心，觀察日治前期臺灣仕紳階層的服裝文化。許多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運用的材料主要是報紙報導或調查報告。這些材料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敘述層面雖然廣，但是卻無法貼近人們實際的日常生活樣態。日記材料正可以補充這方面的不足。透過日記主人翁對每日生活的記述，我們可以更貼近當時人們的生活景觀，具體瞭解他們接觸的人物、觀看的世界，及投入在其中的情感與價值觀。

在日記的選擇上，本文以《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及《黃旺成先生日記》等三部為主。透過日記的記述，可以發現 1910 年代的剪辮改裝風潮之後，男性洋服開始日益流行。西裝、襯衫、詰襟等洋服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各種社交場合，成為社會人士交往迎來的主要服裝之一。至於日式和服在日治前期逐漸進入臺灣仕紳的生活，符合其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應是重要因素之一。

臺灣服原本是臺人的常服、禮服與社交服，用途廣泛。但是 1910 年代開始面臨洋服的競爭後，在許多場合中逐漸被取代，但是並未被淘汰。在黃旺成與張麗俊的生活中，可以見到自 1910 年後半期，臺灣服再度興起，出現在拜壽、祭孔及喪禮等場合。顯然此時臺灣服大多是出現於具有傳統、文化性質的特定場合。又，在林獻堂與黃旺成對於臺灣服的穿用中，可以見到長袍成為臺灣立場與文化傾向的代表，具有象徵在地的、傳統的、文化的意涵。此外，臺灣服也與洋服、和服糅合而呈現出多元的現象。由此觀之，臺人對於服裝，雖然非常「喜新」，但卻也相當「戀舊」。

關鍵詞：日記、服裝、服飾史、臺灣服、洋服、和服、日治前期、社會文化

---

\* 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 年 8 月 19-20 日，感謝評論人林玉茹教授和與會來賓提出的豐富意見，以及匿名審查委員給予的寶貴建議，對本文有相當多的助益與啟發。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來稿日期：2011 年 8 月 29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3 月 23 日。

- 一、前言
  - 二、社交性質的洋式服裝
  - 三、休閒家居的日式服裝
  - 四、性質轉換的臺灣服
  - 五、結論
- 

## 一、前言

本文以日記性質的史料為中心，觀察日治前期臺灣仕紳階層的服裝文化。「服裝文化」意指服裝透過人類的文化活動，承載了人的特殊性、理性思維、感性觀念，甚至市場價值、社會資本等多層面的符號價值。<sup>1</sup> 本文則是著重臺人在從事不同活動、進出不同場合時所選擇的服裝，探討臺人透過服裝的表述方式與內涵。換句話說，是由臺人對服裝的運用，探討洋式、日式與中式（臺灣式）<sup>2</sup> 等不同款式的服裝在臺灣社會中的發展，以及服裝在臺人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少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參用許多報紙報導或是調查報告的描述。這些材料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敘述層面雖然廣，但是卻無法貼近人們實際的日常生活樣態。而目前持續問世、出版的日記材料，正可以充補這方面的不足。透過日記主人翁對每日生活的記述，我們可以更貼近時人的生活景觀，更具體地瞭解他們接觸的人物、觀看的世界，以及在其中投入的情感與價值觀。尤其在其它類型的史料中，甚少有關於物質文化的記述，而記錄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日記，即具有這方面的豐富材料。例如每人每天都會接觸的衣裝，雖有報紙或

---

<sup>1</sup> 本文對「服裝文化」之界定，乃是由物質與文化兩者在概念上與研究中的討論而來。可參見孟悅，〈前言／什麼是「物」及其文化：關於物質文化的斷想〉，收於孟悅、羅鋼主編，《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5。

<sup>2</sup> 清代臺民的中國式袍衫衣裝，在進入日治時期後，洋服與和服大量出現，為了與之區隔，中式長袍遂被稱為「臺灣服」、「臺灣衫」，也因此本文將此款服裝稱為臺（灣）式服裝。

調查的描述文獻，但唯有日記才能更為細緻地呈現時人對於服裝的選擇與情感。不過也需要指出的是日記有其材料性質上的限制，無法作為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總體現象的代表。又，本文引用的日記材料是以 1920 年代及其以前的時間為主，因此是集中於日治前期的討論。<sup>3</sup>

在清代，臺民主要穿著源自中國的清制服裝。進入日治時期後，不斷汲取西方文化的日本，將西洋與日本的服裝文化一齊帶入臺灣。使過去以中國款式為主的臺民服裝，轉變為西洋式、日本式及臺灣式等各種不同風格的衣裝紛陳並存，因此日治時期可說是臺灣服飾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服裝文化發展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於女性服裝的探討，較少關注男性衣裝。<sup>4</sup> 目前有不少日治時期存留的日記逐一出版，由於留下這些日記的多是男性仕紳，因此可由這些日常生活的紀錄中，觀察男性的衣裝穿著，對男性服裝文化進行較深入的瞭解。同時也可與既有的女性服裝研究成果相互對照，探討男性與女性衣裝在發展歷程上的差異。

在日記的選擇上，本文以林獻堂（1881-1956）《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1868-1941）《水竹居主人日記》及黃旺成（1888-1978）《黃旺成先生日記》等三部日記為主。<sup>5</sup> 一方面是由於這三部日記的紀錄時間較長且完整，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三部日記有較多關於服裝的記述，可讓我們對當時仕紳服裝文化有更多層面的瞭解。筆者揀選日記中關於服裝的紀錄，觀察日記主人翁在不同場合中所穿著的衣裝樣款是臺灣式、和式、洋式，或是雜糅各種式樣。<sup>6</sup> 同時檢視穿著衣

<sup>3</sup> 文中部分引用材料至 1930 年代，乃出於舉證之需要，文中另有說明。

<sup>4</sup> 蘇旭瑋，〈臺灣閩族婦女傳統服裝的設計與變化〉（臺北：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夏士敏，〈近代婦女日常服裝演變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ベ（燈籠褲）：戰爭時期臺灣女性的服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7（2009 年 12 月），頁 31-66；洪郁如，〈殖民地台灣的「モダンガール」現象とファッションの政治化〉，收於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タニ・E・バーロウ編，《モダンガールと植民地的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帝国・資本・ジェンダー》（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 261-284。

<sup>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10）。至 2012 年為止，已出版 22 冊，涵蓋年代 1927-1950 年；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臺中：臺中縣文化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4），完整日記 10 冊，涵蓋年代 1906-1937 年。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2012）。迄 2012 年 6 月為止，已出版 9 冊，涵蓋年代 1912-1922 年。

<sup>6</sup> 於此需要說明的是西式、日式及臺灣式服裝各有不同的典儀禮服、一般社交服、家常服等。但是由於日記材料中幾乎沒有作如此細的區分，因此本文依據日記描述，僅區分臺灣式、和式、西式等不同文化風格的衣裝，集中探討不同風格的服裝在日記主人翁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裝與出入場合之間的關係，瞭解日記主人翁在不同的社交活動、事務處理與私人活動中所穿的服裝，以及選擇該服裝的因素，進而探討臺灣式、和式及洋式等服裝，在仕紳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過去關於服裝的討論，有從時尚或政治層面分別探討者，也有綜合兩者共同探究者。<sup>7</sup> 本文將試圖由最貼近生活的日記材料中，觀察是否有其它可能影響服裝選擇的因素。<sup>8</sup>

## 二、社交性質的洋式服裝

西洋服飾早在荷蘭時期就隨著荷人進入臺灣，清代來臺的傳教士也穿著洋服，但是都未在臺灣形成流行。清末 1860 年代臺灣開港後，洋貨大量進入臺灣，開始有較多的民眾穿著西方輸入的布料與衣服。<sup>9</sup> 至日治時期，西洋服飾在臺灣形成大規模的流行風潮。若區分性別來看，男性洋服自 1910 年代開始風行，女性則於 1930 年代後蔚為風潮。<sup>10</sup>

日治時期臺灣男性之改穿洋服，主要是隨著剪辮而發生的轉變。1911 年剪除髮辮活動在臺灣開始風行後，臺民勢必須要有新的西穿衣裝以配合西洋髮型，洋服需求量因此大為增加，洋服裁縫店的客人絡繹不絕。有些裁縫鋪甚至需要從廣東特別聘請富有製作洋服經驗的裁縫師前來，以支應龐大的需求量。<sup>11</sup>

但洋服所費不貲，當時一套三件式的西裝價格是金 20-50 圓，上下兩件式一套的詰襟（つめえり，立領衣）<sup>12</sup> 是金 12-30 圓，長大衣式的外套一件金 23-50

<sup>7</sup> 例如洪郁如與張世瑛皆是結合政治與時尚共同探討服飾問題。參見洪郁如，〈殖民地台湾の「モダンガール」現象とファッションの政治化〉，頁 261-284；張世瑛，〈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

<sup>8</sup> 一般所謂的「服飾」、「服裝」可能包含了上、下身的衣裝，加上鞋、帽、襪等，有時甚至包括眼鏡、耳環、項鍊、手鍊等配件。但本文所討論的服裝，限於日記史料中所記錄的種類，因此以衣裝與鞋子為主，另加上日記偶爾提及的帽子，作為本文探討的服裝範疇。

<sup>9</sup> 吳奇浩，〈清代臺灣漢人服飾之消費與生產〉，《臺灣文獻》59: 3（2008 年 9 月），頁 221-258；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採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頁 56-58。

<sup>10</sup> 洪郁如，〈殖民地台湾の「モダンガール」現象とファッションの政治化〉，頁 264-269。

<sup>11</sup> 〈特聘衣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6 月 26 日，第 3 版；〈降價發售〉，《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31 日，第 3 版。

<sup>12</sup> 「詰襟」（つめえり）是一種西式立領的長袖上衣，與文官制服的樣式很相近。不過穿文官制服時，必須搭配規定的褲子、皮鞋與帽子，典禮時還須加上肩章和長劍。詰襟則可單件上衣，下身配一般長褲與鞋子，這也是黃旺成平常外出時的穿著之一。

圓，短外套一件金 17-45 圓；即便是夏季洋服，上等者價約 5 圓，次等的 3 圓。<sup>13</sup> 當時擔任學校訓導的黃旺成月薪是 18-22 圓，一套西裝或是一件大衣的價格大約就等於一位教師一個月的收入。<sup>14</sup> 因此對於收入一般者而言，洋服顯然是一筆昂貴的開支。於是有一些人士提出剪辮不改裝活動，就是剪去辮子，但是仍穿長袍式的臺灣服，以節省荷包開支。但又有人擔心如此會被嘲笑是「西人首，華人足」，於是又建議大家修改原有的長袍馬褂，將衣襟、袖子及衣長加以修改，使樣款看起來比較像西洋服裝。<sup>15</sup>

無論是花大錢買洋服，或是將臺灣服「自行改裝」成洋服，我們都可見到當時男性們在剪辮改裝上所做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將自己的衣裝樣貌朝向西洋式的方向改變。換上洋服，象徵著自己衛生、進步、文明，<sup>16</sup> 思想新穎且趕得上流行，不會落於人後。換穿洋服至此已經成為不可抵擋的趨勢，當時報紙也時常報導因斷髮人數增加，洋服大量銷售的現象。<sup>17</sup> 在日記材料中，也可見到這一大變革浪潮，在實際生活中的發生過程。

<sup>13</sup> 〈物價表〉，《實業之臺灣》2（1909年10月10日），頁57。

<sup>14</sup> 依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的紀錄，黃旺成1913年的月薪是18圓，1914、1915、1916年是20圓，1917年是22圓。至於日記上的紀錄，1916年6月20日記載未扣臨時費的月薪20圓，1919年7月31日領取月薪15圓。參見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二年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3），頁201；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三年版）》，頁210；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四年版）》，頁212；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五年版）》，頁219；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六年版）》，頁22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五）》，1916年6月20日，頁11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七）》，1919年7月31日，頁174。

<sup>15</sup> 如《臺灣日日新報》即提供三種「華服改製西式法」：1. 修改長袍，大襟改作直襟，用大扁骨鈕，衣長與袖長都裁短；2. 改馬褂，將大袖改為長小袖，大襟改為直襟，也用扁鈕；3. 半臂（短外衣）改成像緊身短夾襖一般。參見〈華服改製西式法〉，《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月9日，第5版。

<sup>16</sup> 當時關於剪髮改裝象徵衛生、文明、思想進步等的論述相當多，以下茲舉數例。例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詩文：「而今斷去蓬々髮，生面別開異昔年；省却梳頭還打辮，泰西裝束亦安然。昔除一半今除盡，進化時機迥不同；敢說文明新面目，免他覆頂累愁攻。斷髮實為衛生上大有獲益，去其無用之物，以圖一身之便，何等爽快。洪君東上，濡染文明，概然斷髮，其意蓋在此也。……」參見〈藝苑：植亭漫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6月26日，第1版。《臺灣日日新報》中的詞：「年少偏々俊傑英，改裝斷髮事文明。而今更吸新空氣，壯哉班生此一行。」參見王炳南〈送吳乃占君東京觀光〉，《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19日，第1版。「或人問斷髮，衛生便利而外，於文明更有關乎？曰有。儒夫優柔不斷，知大勢之如此，而不能實行也。夫歐美諸一等國民，其器識皆不遲大勢之進步，斷髮者文明之先聲也。有此英斷而能求適合大勢，何事業不可為哉？」參見小呷生〈楊花點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3月12日，第1版。

<sup>17</sup> 《臺灣日日新報》載：「近來剪髮膨脹，洋服製造店，十分發達。如大稻埕……。」參見〈洋服製造發達〉，《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0日，第5版。

## （一）洋服與皮鞋的初現

臺中豐原的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與新竹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中，記錄了1910年代臺灣男性服裝發生的轉變。張麗俊的日記中可以見到他在觀念與衣裝方面的轉變，從認為應維持髮辮與臺灣服，到自己剪斷髮辮、改穿洋服的完整過程。1911年2月，張麗俊寫信給女婿袁錦昌，<sup>18</sup>說明自己對剪髮和改裝的看法。<sup>19</sup>在此之前袁錦昌有成立斷髮會的念頭，寫信問張的意見。張麗俊回信先說到袁的長輩嚴厲反對斷髮，要張也寫信反對袁立會斷髮。張麗俊接著分析剪髮的缺點大於優點，缺點有三：1. 剪髮必須改裝，改裝要花耗衣費頗多；2. 剪髮雖然可以有文明的外殼，但是卻很難因此學好醫學（袁當時就讀總督府醫學校）；3. 剪髮有適合好看的，也有不適合不好看的，不好看的會被取笑。但優點只有一個：早上不用整理髮辮。此時張從開銷、學業、審美觀三個方面出發，反對剪辮改裝。

但是僅相隔1年，張麗俊原本全然反對剪髮辮、改穿洋服的態度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1912年9月18日張麗俊的日記中首次出現洋衣，這天張麗俊「令裁縫製洋衣」。<sup>20</sup>再過幾天，9月26日張與一群友人前往謝頌臣家祝壽後，<sup>21</sup>被朋友們力勸剪去髮辮，詩友們說櫟社只剩下張麗俊和陳基六兩位詩友未剪辮，而且還有已經備妥的笙簫酒宴（為壽宴準備），「剪髮何等之光榮」。<sup>22</sup>張麗俊雖有猶豫，但是難抵眾人勸說，於是剪去留了數十年的辮子。在剪髮的過程中，張的朋友們「環列而觀」，且有超過三十人來幫忙。剪完後，朋友們拿洋服（應為西裝）將張麗俊打扮成西洋裝束，再共同入席吃壽宴，一群友人吃飯喝酒到晚上快十二點才散去。在這整個過程中，可以見到張麗俊的友人大多數都已剪除辮子，且對於張一同剪辮改裝顯得相當歡欣。

<sup>18</sup> 袁錦昌，張麗俊的大女婿，妻采鸞，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曾自行開業，一度擔任船醫，之後往東北開設錦昌醫院，戰後回臺前過世。參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1冊，頁5，書前照片。

<sup>19</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3冊，1911年2月11日，頁13。

<sup>20</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3冊，1912年9月18日，頁264。

<sup>21</sup> 謝頌臣本名謝道隆（1852-1915），字頌臣，亦作頌丞，臺中潭子人。甲午戰爭爆發時，謝道隆與表弟丘逢甲募結義軍。日軍登陸後，丘逢甲與謝道隆倉皇內渡，後再返臺，日本政府任命為區長。因精通岐黃，開設泰和藥鋪。又組詩社，有詩集《小東山詩存》。參見許雪姬撰，〈謝道隆〉，收於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1300-1301。

<sup>22</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3冊，1912年9月26日，頁269-270。

之後為了配合西式髮型，張麗俊也開始添購洋服。1913年10月8日到張得裁縫店訂製兩件天藍羽洋服，10月23日再往新源順訂製洋裝（洋服），隔天還去看看是否訂作完成。<sup>23</sup> 同年11月5日，因為去藥局碰到臺中製洋服裁縫陳泉，也順道訂製了一件呢羽絨洋服。<sup>24</sup>

是年，住在新竹的黃旺成也記述了自己剪去髮辮、換穿新裝的時程。1913年3月31日，黃旺成任職的新竹公學校發下任命書，黃等5位臺灣人正式擔任新竹公學校的訓導，可以開始穿文官制服，於是當天5人都前往古川出張所訂製文官服。<sup>25</sup> 兩天後，即4月2日，黃旺成在朋友的簇擁下，被帶去剪辮子。<sup>26</sup> 訂製的文官制服則是4月7日送來，隔天黃旺成就穿去學校教課。<sup>27</sup> 此外，在重要節日儀典時，文官制服需要配上肩章與長劍（圖一）。因此，接到正式任命狀而可穿文官制服，應該是促成黃旺成剪辮的主要原因。



圖一 黃旺成穿著文官制服照片（1913年）

說明：1913年黃旺成任教於新竹公學校時的冬季文官制服，配有肩章與長劍，為參加典禮時的衣裝。圖片來源：〈黃旺成個人照〉，《黃旺成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T0765\_0002。

<sup>23</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3冊，1913年10月8日、23-24日，頁274、279。

<sup>24</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3冊，1913年11月5日，頁284。

<sup>25</sup> 日治時期臺灣文官制服是自1899年由日本導入，1920年代臺灣的報紙、期刊還引發文官制服存廢的激烈論戰，但仍繼續施行直到日治時期結束。詳可參見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灣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頁105-153。

<sup>26</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4月2日，頁120-121。

<sup>27</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4月7-8日，頁126-128。

此套文官制服，始於 1899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頒布的文官服制，適用對象包括勅任官、奏任官及判任官。<sup>28</sup> 至 1913 年 3 月 30 日，總督府發布訓令，將學校訓導歸入文官服制的適用範圍後，擔任訓導的臺籍男性教師開始換上判任官的制服。<sup>29</sup> 款式為黑色立領短外套、黑色長褲，頭戴有金色旭日章的黑色大盤帽，配戴長劍，並有「台」字形徽章的金色肩章。(參閱附錄圖九~十)

除了學務上的制服外，黃旺成為了社交場合添購的幾件西衣服裝，包括皮鞋、襯衫、詰襟及西裝，首次出現的時間都集中在 1912-1914 年間。其中，最先購買的是西式皮鞋。1912 年 12 月 19 日，黃旺成向「日益堂靴屋」的老闆吳庚爐預定了一雙皮鞋，<sup>30</sup> 價格 7.5 圓，12 月 28 日完成後叫雇人桂仔拿回家。<sup>31</sup> 幾天後的元旦，也就是 1913 年 1 月 1 日，黃就穿上這雙新皮鞋前往學校，參加學校的新年典禮。1 月 23 日黃再度穿這雙皮鞋到校教課，有龜田鞋店的業務員來學校，並且跟他們討論這雙鞋，確定這是用德國的高級皮革所製造的皮鞋。<sup>32</sup> 從這裡的細節描述可以窺見黃旺成對於這雙高級皮鞋有一定的自豪，同時也相當愛護。當天下午要回家時突然起了大風雨，黃擔心皮鞋弄髒受損，還另外新買一雙木屐換穿，將皮鞋帶回村家。隔天一早下著小雨，但黃旺成想在學校穿皮鞋，於是把皮鞋包在披風裡，先穿著木屐出門，到學校再換上。<sup>33</sup> 他對於這雙西洋皮鞋的喜愛與珍惜，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西式制服和皮鞋以外的西衣服裝，黃旺成的日記中首次出現洋服是在 1913 年 8 月 1 日。這天黃旺成穿著白洋服（應為襯衫），戴著斗笠，腳上穿著木屐，前往新竹城中購買白皮鞋。<sup>34</sup> 之所以戴斗笠、穿木屐，是因為當天的天空陰暗有雲，隨時可能會下雨，回程時果然下起大雨。如此，黃旺成頭戴傳統臺灣帽，身穿西衣服裝，腳下踩的是日式木屐，洋風、和風與臺灣風雜糅於一身。可見當時服裝並未講究整體風格的搭配，只要適合環境條件需要，不論是傳統斗笠或是

<sup>28</sup> 內務大臣侯爵西鄉從道，〈臺灣總督府文官ノ服制左ノ通定ム但シ別ニ規定アルモノハ此ノ限ニアラス〉，《臺灣總督府府報》475（1899年3月10日），頁15。

<sup>29</sup> 臺灣總督伯爵佐久間左馬太，〈臺灣總督府文官服制ハ左ノ臺灣總督府官吏待遇者ニ之ヲ適用ス〉，《臺灣總督府府報》184（1913年3月30日），頁92。

<sup>30</sup> 管武雄，〈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新竹：自刊本，1938），頁180。

<sup>31</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年12月19日、28日，頁556、569-570。

<sup>32</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1月23日，頁37-38。

<sup>33</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1月24日，頁39。

<sup>34</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8月1日，頁279-280。



日式木屐，都可以混合穿用。至於正式的西裝，雖然黃旺成在 1913 年就想購買，但是同年 4 月與父親商量未果，<sup>35</sup> 11 月大阪西服店的人來學校，想要訂製卻也沒有做成。<sup>36</sup> 直到 1914 年 1 月 14 日，才收到林茂泰送來的訂作西裝。<sup>37</sup> 第一次穿西裝是約半個月後的 2 月 1 日，場合是在李良弼家開的詩會。<sup>38</sup> 3 月 21 日則是第一次穿西裝到學校教課。<sup>39</sup>

林獻堂先生所留下的《灌園先生日記》始自 1927 年，雖無法窺得林獻堂改裝的過程，但其後的紀錄也可見到他不時購置西裝。與黃旺成、張麗俊不同的是林獻堂財力豐厚，購置的洋服明顯較為高級，且常有洋服店老闆親自到林家為林獻堂訂做洋服。例如 1933 年 12 月 28 日三丸洋服店老闆前來霧峰林家，為林獻堂訂製洋服，隔年 1 月 5 日再拿製成的洋服到林家讓林獻堂試穿，1 月 24 日三丸洋服店老闆再來，林獻堂又再訂了一件外套。<sup>40</sup>

出國時，林獻堂購買洋服的紀錄更為頻繁。例如 1938 年 1 月 5 日，林獻堂與楊子培在日本銀座的高橋洋服店訂做一件西裝，衣料 160 円，工資 55 円，總計 215 円。<sup>41</sup> 1 月 8 日與成章往伊勢丹買チョコキ (jack)。<sup>42</sup> 同年 4 月 6 日，又與林攀龍往銀座川瀨洋服店訂做洋服，1 件 150 円，接著再到松屋買ガウン (gown，長大衣)，1 件 32 円。<sup>43</sup> 7 月 6 日至銀座カワセ洋服店訂做洋服，10 月 19 日到河瀨洋服店訂製半禮服。<sup>44</sup> 11 月 18 日再至カワセ洋服店是穿モーニング，又再訂做外套一件。<sup>45</sup> 1938 這一年之中，林獻堂訂製洋服的紀錄就有 8 件，其中

<sup>35</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4 月 7 日，頁 126-127。

<sup>36</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11 月 11 日，頁 392-393。

<sup>37</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1914 年 1 月 14 日，頁 15-16。

<sup>38</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1914 年 2 月 1 日，頁 33-34。

<sup>39</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1914 年 3 月 21 日，頁 82-83。

<sup>4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 年 12 月 28 日，頁 495；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 年 1 月 5 日、24 日，頁 7、38。

<sup>4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 年 1 月 5 日，頁 5。

<sup>42</sup> チョキ，即チョコッキ，jague（葡）、jack（英），西裝背心。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 年 1 月 8 日，頁 7。

<sup>4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 年 4 月 6 日，頁 88。

<sup>4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 年 7 月 6 日、10 月 19 日，頁 164、267。

<sup>45</sup> モーニングコート (morning coat)，上衣只有一顆扣子，長至膝蓋，材質是純黑色柔軟光滑的布，搭配整條紋的褲子，背心與上衣的顏色必須一致。原先是早餐會穿的禮服，之後晚間亦可穿著。日本人將コート省略，而稱モーニング。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 年 11 月 18 日，頁 297。

不乏價格不斐者，可見洋服對於社交活動相當頻繁的林獻堂而言有一定的重要性。

從以上日記，可以見到這三位臺灣仕紳漸次換穿西服裝。而此剪辮後改換洋服的情形，也是當時的社會風潮。例如臺北的洋服店即因而生意鼎盛：「爾來斷髮之風日盛，洋服之需要日增。臺北城內及大稻埕之新開洋服店，及擴張業務者時有所聞。」<sup>46</sup> 南部也出現訂製洋服的熱潮：「本島人斷髮流行……其中伊藤、澤田兩軒洋服裁縫店，定製衣裳者絡繹不絕，其價遂昂一二。」<sup>47</sup> 宜蘭也出現相同的情形：「聞到蘭城訂購洋服者，趾踵相接云。」<sup>48</sup> 可見臺灣男性剪辮之後，改換洋裝之風頗盛。

張麗俊和黃旺成也是剪辮之後開始穿洋服，他們同樣都是被朋友們起鬪而剪去髮辮。張麗俊的剪髮過程相當熱鬧，黃旺成對於新買的西洋皮鞋也頗為自豪，可見兩者的換裝可以說是符合眾人與自己的期待，且是當時社會的普遍潮流，洋服在此時也成為臺灣社交場合的正式服裝之一。因此，社交活動相當頻繁的林獻堂自然也購置多件洋服，以備在必要的社交場合中穿用。

身著服裝與出入場合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在檢視洋服於日記中初現的過程後，需進一步瞭解穿著洋服的場合。在目前留存的日記中，以《黃旺成先生日記》對服裝的紀錄最為詳盡，接著就以這部日記為主，分類並統計洋服的出現次數與穿著場合。

## （二）穿著洋服出席的場合與次數

以下將《黃旺成先生日記》中記錄穿著洋服的場合區分為數個類型：臺人社交場合、日人社交場合、事務及學務等。之所以如此區分，原因在於出入場合與穿著衣裝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衣服雖然是穿在自己身上，但是主要觀看者並不是穿衣者本人，而是周遭其他的人。服裝會影響著與周遭的人們之間的互動，因此有必要區辨各種不同的場合。又因為日治時期臺人與日人的身分不同，因此社交場合再有臺人與日人社交場合的區別。此外，本文將黃旺成穿著的西服裝暫區分為兩類，一是西裝、襯衫、詰襟（立領衣）等人們自行選擇的穿著；另一類是

<sup>46</sup> 〈洋服商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8月4日，第2版。

<sup>47</sup> 〈降價發售〉，《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7月31日，第3版。

<sup>48</sup> 〈宜蘭實行斷髮〉，《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11月3日，第6版。

由官方規定樣式的文官制服。下表一、二、三為黃旺成穿著西衣服裝的場合與次數的紀錄表。

表一 黃旺成穿著洋服之紀錄表（1913-1921年）

年度	衣裝	場合	地點	次數	屬性	
1913	詰襟	找玉卿	—	2	私人活動	
	詰襟	回家	—	2	私人活動	
	詰襟	登校途中	—	2	學務	
	詰襟、鴨舌帽	與友人遊臺北	—	1	臺人社交	
1914	詰襟	登校途中	—	1	學務	
1915	西裝	元旦	學校	1	學務	
	西裝	友人家吃飯、校長講話	友人家+校長	1	臺人社交+學務	
	西裝	登校	學校	1	學務	
	西裝	有中港約	—	1	臺人社交	
	西裝	風俗改良會	教堂	1	公眾事務	
	西裝	詩會	胡桂林家	1	臺人社交	
	西裝	不明	—	1	—	
	洋服	探望阿部、探友病	阿部校長家、醫院	1	日人社交	
	洋服	看病	醫院	1	看病	
	詰襟	前往學校	—	3	學務	
	詰襟	宗教調查	—	1	處理事務	
	詰襟	吃飯後登校教業學	學校	1	學務	
	1916	西裝	詩會	野馬家、曾瑞堯家	2	臺人社交
		西裝	新人歡迎會	學校	1	學務
西裝		查法規+泉興請客	泉興	1	臺人社交	
西裝		訪田代談組合	田代處	1	處理事務（日人）	
西裝		各處拜訪	—	2	臺人社交	
西裝		前往學校	學校	1	學務	
西裝		新竹俱樂部	新竹城內	1	臺人社交	
1917	西裝	與友人往學問會、友人聚會		1	臺人社交	
	白洋服	與友人往俱樂部開總會		1	臺人社交	
	西裝	到校練習夜學會出演者、詩會		1	學務+臺人社交	
1919	西裝	泉興招待	泉興	1	臺人社交	
	西裝	徐慶祥招待	徐慶祥家	1	臺人社交	
	灰西裝	詩會	女子校	1	臺人社交	
	西裝	至泉興幫忙	泉興	1	處理事務	
	西裝	顧店	店裡	1	處理事務	
	西裝	不明	—	2	—	
	洋服	詩會	女子校	1	臺人社交	
	洋服、皮靴	同窗會	學校	1	臺人社交	
	洋服	訪山林調查員	—	1	處理事務	
	洋服	登山	—	1	私人活動	
	詰襟	顧店	店中	1	處理事務	
詰襟	訪鄭舉人	鄭家	1	臺人社交		

	詰襟	婦人修習會	學校	1	公眾事務
	詰襟	亂彈詩會	新竹女子公學校	1	臺人社交
1921	西裝	與東家去、自行去	警察署	2	處理事務
	西裝	蓋印	調停所	1	處理事務
	西裝	與東家去	各銀行	1	處理事務
	西裝	與東家去	各處拜訪	1	處理事務
	西裝	與東家去	訪中村頭取	1	日人社交
	洋服	與四奶去	往車站	1	臺人社交
	洋服	林烈堂新婿陪賓	(僅黃一人洋服)	1	臺人社交
	洋服詰襟	郵便局辦事	郵便局	1	處理事務
	詰襟	訪鈴木	鈴木家	1	日人社交

資料來源：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八）》。

說明：「—」表示無紀錄資料，以下皆同。表中的「洋服」與「西裝」並不相同，有時洋服應是指西裝，有時則無法判定。

表二 黃旺成穿洋服出席場合之次數統計表

場合屬性	臺人社交	日人社交	處理事務	公眾事務	學務	看病	私人活動	不明	總計
次數	22	3	12	2	13	1	5	3	61

資料來源：整理自上表一。

表三 黃旺成穿著文官制服次數統計表

年	服裝	次數	備註
1913	制服	11	配肩章、長劍 1 次：天長節
1914	制服	14	配肩章、長劍 2 次：紀元節、畢業典禮
1915	制服	17	配肩章、長劍 2 次：昭憲皇太后一年祭、大嘗祭
1916	制服	15	配肩章、長劍 1 次：始政紀念日
1917	制服	5	
小計		62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六）》。

黃旺成穿著西洋服裝出席的場合共有 61 次紀錄，其中 22 次是臺灣人的社交場合，3 次是與日本人的社交場合，12 次是辦理事務，前往學校 13 次，參加風俗改良會、婦人修習會此類的公共事務有 2 次，看醫生 1 次。有制服紀錄的次數共有 62 次，1913-1916 的四年中每年皆紀錄十餘次。<sup>49</sup> 若將社交場合、公眾事務及

<sup>49</sup> 需要說明的是，各種日記材料中，最多穿著服裝紀錄的《黃旺成先生日記》，一年中有穿著服裝的紀錄最多數十件，即一年中至多僅有數十日的服裝紀錄，並非每天都會描述所穿的衣服。因此本文的統計是就日記有出現的紀錄加以統計，並不是完整的每日服裝統計，也不能以此代表黃旺成所有的服裝樣態。但即使有此限制，日記中的服裝描述、紀錄仍然是具體事實。因此，本文仍將其分類、統計，試圖從有限的資料中找出一些服裝文化發展的現象、特點，用以呈現並討論服裝文化的發展歷程、傾向及相關問題。

處理事務等三種場合同歸類為公開場合，計有 36 次。可知西裝與詰襟等洋服主要是穿用於各種公開場合中，洋服儼然已成為社會上交往迎來的主要穿著之一。當時報紙也描述：「近時剪辮風行，人多趨於穿著洋服。……人必購買一、兩付洋服，以為應酬之備也。」<sup>50</sup> 而另一種洋服——「文官制服」，黃旺成則是在參加學校相關事務、活動中才會穿著，一般公開場合中穿著的洋服仍以西裝和詰襟為主。

在社交場合中，如宴會、同窗會、探訪友人等，黃旺成都是穿著洋服。甚至是漢文化性質濃厚的詩會，詩友們也多改穿洋服，如同前述張麗俊的詩友大多都已剪辮改裝，黃旺成穿洋服出席詩會的紀錄也有 5 次。從黃旺成參加詩會的照片中，也可見到黃的詩友們也都已剪除髮辮，換穿洋式服裝（圖二）。

在許多社交場合中，黃旺成都會穿著洋服出席。但是在婚宴、壽宴等較傳統的典儀中，並非所有人都會穿著西衣服裝。例如 1921 年 6 月 6 日黃旺成前往林



圖二 黃旺成詩友合照（1917 年）

說明：新竹公學校與新竹女子學校職員組成的亂彈詩會，後排左四為黃旺成。這群詩友皆為學校職員，都已剪辮，且穿著西式的文官制服（除中間站立者）。

圖片來源：〈黃旺成與亂彈會成員合影〉，《黃旺成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T0765\_0016。

<sup>50</sup> 〈洋服與常服之比較〉，《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7 月 14 日，第 5 版。

烈堂家作新婿陪賓，開席時「獨予一人洋服而已」，可知只有黃旺成穿洋服，其他賓客與主人都是穿著臺灣服（長袍）。可見當時在婚宴這一類的場合中，洋服尚未成為普遍的禮服。雖然此時男性洋服的流行已開展數年，但是在這種具有傳統性質的典禮中，多數人還是傾向穿著臺灣服。因此在某些特殊場合中，臺灣服仍然是必要的衣裝，具有一定的象徵意涵（臺灣服之性質將於後文詳述）。

### 三、休閒家居的日式服裝

一般對於日本傳統服裝的主要印象有二：木屐與和服。木屐起源於約四千年前的中國，之後盛行於吳、越地區，成為中國南方頗為流行的鞋款。<sup>51</sup> 宋代以後風潮不再，但是並未完全消失。至清代，臺民的鞋種中仍有「屐」，但此時「屐」是鞋類的泛稱，人們很少穿木屐，比較常穿的是草鞋、棉布鞋、綢緞鞋、繡花鞋等。<sup>52</sup>

在日本方面，木屐起源可追溯至藤原時代（約十世紀），之後持續發展並廣布，享保年間（十八世紀前期）普及於男性，到了延享年間（十八世紀中期）也流行於女性，<sup>53</sup> 進而成為日本服裝的代表之一。日本統治臺灣後，木屐也隨之成為最早進入臺民生活的日式服裝，在黃旺成日記中不時可見到穿著的紀錄。

#### （一）日記中的木屐與和服

黃旺成開始穿木屐，主要是因為新竹天氣多雨潮濕。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的紀錄來看，木屐自 1912 年底開始出現於黃的生活。1912 年前半年，黃旺成在雨天是穿著足袋、綁腿，外面再加上草鞋。<sup>54</sup> 但是這樣的穿著並不防雨，仍然會弄濕鞋、褲，連黃都覺得雨天又碰到難走的路，回到家後自己的「鞋子與褲子比

<sup>51</sup> 林華東，〈話說木屐〉，《故宮文物月刊》102（1991年9月），頁116-119。

<sup>52</sup> 《苑裏志》：「官紳家有事，則著靴；色鞋，其常著也。俗人，則以烏布鞋、蒲草鞋代之。」又，《臺灣通史》：「漳泉婦女大都纏足，以小為美。三寸弓鞋，繡造極工。」又，《新竹縣志初稿》：「足穿曰靴（以緞為之）」。參見蔡振豐等，《苑裏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48種，1959年原刊），頁85；連橫，《臺灣通史》（文叢第128種，1962；1920年原刊），頁604；鄭鵬雲、曾逢辰編，《新竹縣志初稿》（文叢第61種，1969年原刊），頁178。

<sup>53</sup> 江馬務，《結髮化粧小間物履物史》（東京：雄山閣，1973），復刻本，頁133-138。

<sup>54</sup> 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年5月22日，頁244-245。

乞丐更狼狽可笑」(「村家に帰り靴・褲は乞丐より可笑し」)。<sup>55</sup> 於是從 7 月 23 日起，黃旺成開始試著穿木屐，起初也覺得很難走路：「六點過後從店裡穿木屐歷盡艱辛，七點半回到村家。」<sup>56</sup> 但是漸漸習慣了之後，只要在下雨天，黃就常常穿木屐外出。若是去學校上課需要穿皮鞋，則是在路途中穿木屐，皮鞋先用披風包好，帶到學校後再換穿。<sup>57</sup>

由黃旺成的日記來看，木屐之所以進入其生活，是因為具有通風又快乾的特性，適合臺灣潮濕多雨的天氣，即使大雨淋濕也可快速恢復乾燥，因此為黃所穿用。此外，報紙報導也呼應這種情形，說穿木屐除了不用擔心下雨潮濕之外，也比臺灣鞋便宜，因此穿用者持續增加。<sup>58</sup> 在木屐需求量持續增加的情況下，臺人的鞋店大多同時販售日本輸入的木屐與皮鞋，相當受年輕人喜愛。<sup>59</sup>

在和服方面，由於男性和服的設計寬鬆，方便從事一些日常活動，也開始出現在黃旺成的生活中。和服大致上可分為輕鬆場合穿的單件「普段着」、外出上街或訪問時穿的「外出着」(大多是長衣加羽織)，以及在正式場合穿的「礼装」(羽織上有家徽)。黃旺成在日記中並沒有寫明所穿的和服樣式，一概記錄為「和服」。而由出入的場合推測，其所穿著的和服應該是「普段着」或「外出着」，都是屬於比較便利、輕鬆的和服。1913 年的 4 月 29 日，黃旺成在學校教完課後和同事張澤一同去店裡買了和服與腰帶。<sup>60</sup> 但買了之後，黃旺成並非隔天就穿上和服前往學校教課，還經過適應跟試穿。買和服的當天晚上，黃跟同事張澤約好晚上住在學校，為了搭配和服，於是先派人到學校把之前買的木屐拿回家，夜間穿一整套的日式衣裝從店家去學校。隔天，也是在學校換穿和服。<sup>61</sup> 5 月 1 日是穿夏季的白色文官服，帶著和服前往學校。<sup>62</sup> 在經過幾天的適應之後，5 月 2 日才穿和服，從店家前往學校教課。<sup>63</sup>

<sup>55</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 年 5 月 14 日，頁 231-232。

<sup>56</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 年 7 月 23 日，頁 344-345。

<sup>57</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1 月 24 日，頁 39。

<sup>58</sup> 「新竹街及び竹南郡管内方面にて、内地人下駄を使用するもの近時著しきを示せる。」〈島人と内地下駄〉，《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

<sup>59</sup> 〈皮鞋之需要量增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3 月 21 日，第 4 版。

<sup>60</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4 月 29 日，頁 156。

<sup>61</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4 月 30 日，頁 157-158。

<sup>62</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5 月 1 日，頁 159-160。

<sup>63</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5 月 2 日，頁 160-161。

和服在臺灣社會的發展大約也是始於 1910 年代。雖然不如洋服有高度的普遍性，但確實有不少臺人開始穿起和服與木屐。報紙上報導斷髮改裝後，人們不僅買洋服，也買和服，臺南市的和服店因此應接不暇，甚至必須借助女紅一同裁製客人訂做的和服。<sup>64</sup> 此外，學校教育對於日本文化與服裝價值觀的推廣，使學生日漸接受和服，也促使穿和服的人數增加。<sup>65</sup>

由此，從黃旺成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見到自日本統治臺灣十餘年後，含有日本元素的服裝因為具有一定的實用性，逐漸進入臺人生活。接著將進一步觀察穿著和服出入的場合與從事的活動，探討和服在黃旺成生活中的角色。

## (二) 和服出席的場合與次數

表四 黃旺成穿著和服之紀錄表（1913-1921 年）

年度	衣裝	場合	地點	次數	類別
1913	和服	下課後才穿到學校	學校	1	學務
	和服	上課	學校	7	學務
	和服	看醫生	醫院	3	看醫生
	和服	到店裡	店	1	私人活動
	和服	到學校乘車途中	途中	1	私人活動
1914	和服	與友人出遊	—	1	臺人社交
	和服	回村家	途中	1	私人活動
	和服	往學校途中	途中	1	私人活動
	和服	散步	散步	1	私人活動
1915	和服	到城驗貨	城中	1	處理事務
	和服	剪髮	—	1	私人活動
	和服	詩會	—	1	臺人社交
	和服	看醫生	—	2	看醫生
	和服	吃飯+宗廟調查	—	1	臺人社交
	和服	下棋	—	1	臺人社交
	和服	學校看報	學校	1	私人活動
	和服	退校後家中	家中	1	私人活動
1916	和服	泉興招待	泉興	1	臺人社交
	和服	詩會	李良弼家	1	臺人社交
1917	和服	到校看報	學校	1	私人活動
	和服	下課後攜子散步	學校、車站	1	私人活動

<sup>64</sup> 〈製和服之繁忙〉，《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6月24日，第3版。

<sup>65</sup> 〈和服次第に増加／中部本島人間に〉，《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8月4日，第7版；〈公學教育の進步／陋習既に革まる臺南廳下の發達／和服の傾向〉，《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1月2日，第3版；〈鳳山女生和裝〉，《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26日，第4版。



	和服	到校看報	學校	1	私人活動
	和服	到校算成績	學校	1	私人活動
	和服	到校看報	學校	1	私人活動
	和服	到校看報	學校	1	私人活動
	和服	出訪友人、下棋	北郭園	1	臺人社交
	和服	到校看報、看下棋	學校	1	私人活動
1919	和服	柳湯入浴	—	1	私人活動
	和服	洗身後	洗身後	1	私人活動
	和服	吃飯下棋	元豐、泉興	1	臺人社交
	和服	換和服招鄭	—	1	臺人社交
1921	和服	與東家雜談	事務所	1	臺人社交
	和服	家中	家中	5	私人活動
	和服	入浴	入浴	1	私人活動
	和服	與東家出遊出訪	—	1	日、臺人社交
	和服	出訪坂本	—	2	日人社交
	和服	訪阿部	—	1	日人社交
	和服	火車中休息	火車中	1	私人活動

資料來源：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八）》。

表五 黃旺成穿著和服出席場合之次數統計表

屬性	臺人社交	日人社交	日、臺人社交	學務	看醫生	私人活動	處理事務	總計
次數	10	2	1	8	5	24	1	52

資料來源：整理自上表四。

由以上整理的紀錄來看，在黃旺成的日常生活中，和服已經成為重要的服裝之一。從與友人的社交活動，到私下的個人生活，都不時可以見到他的穿著紀錄。例如 1913 年 9 月 28 日，這天是休假的星期日，黃旺成穿著和服、木屐，和同樣穿著木屐的張式穀、李良弼一同前往張澤家。大夥兒先一起吃餅乾、芭蕉及小米粥等點心，接著去客雅溪散步、觀看捉鰻魚，中午過後回張澤家參加宴會、作詩，到了五、六點再吃花生湯與螃蟹。<sup>66</sup> 一群地方鄉紳在週末假日，悠閒地穿著和服、木屐隨處遊玩，顯然穿著和服已經成為相當自然的事情。在其它的私人活動中，如散步、剪髮、入浴、看醫生等，黃旺成也會穿著和服，可見和服有成為常服的傾向。

此外，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一般認為臺人在與日本人交往迎來時，會較常穿和服與日人互動，以獲得其認同，使事物更順利進行。但是在黃旺

<sup>66</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9 月 28 日，頁 349-350。

成的生活中，穿和服拜訪日人的紀錄僅有2次，反而是與臺人互動的社交場合中穿著和服的紀錄有10次，包括例行的詩會、受朋友招待餐宴，或是與朋友下棋等多種社交場合。其次，在穿和服的52次紀錄場合中，次數最多者是從事私人活動24次，接著是社交場合13次。可見黃在私人活動時也常穿著和服，例如散步、剪髮、看醫生、入浴洗澡及在家中休息時。且像看醫生時，黃旺成會穿著和服，應該是由於和服寬鬆，穿脫容易，方便醫師診查。由此可知和服在黃旺成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重要性。

除了黃旺成之外，吳新榮也基於便利性，將和服作為一般常服穿用。1938年1月的日記中，記錄了當時所過的日式生活：

我們每天做完了工作，就脫下西裝，換上和服和木屐，半天過和服生活；吃醃蘿蔔、味素湯、生魚片、日式火鍋。又以家中設他他米寢室為榮。而後以日本話談話，用日文寫作，最後以日本式的方法來思考。一切只為了方便。「方便」與「必要」成為同化的不可缺條件。我們是被方便與必要所迫，而被同化的臺灣人。任何人都認為我們是日本人。恐怕大和民族形成以前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吧！<sup>67</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吳新榮寫得很直接，他們在當時穿和服和木屐、吃日式餐點、說日語、寫日文、甚至用日文思考，以致於大家都會以為他們是日本人。但其實他們過日式生活的動機很簡單，純粹只是因為「方便」、「必要」而已。對吳而言，和服與木屐就是工作之後、閒暇休息時的穿著，而這與黃旺成同樣僅是出於便利性的考量。<sup>68</sup>

總此，由黃旺成的日常生活來看，和服不僅是與日本人交往迎來時的衣著，也十分頻繁地出現在與臺人互動的社會場合中。此外，在穿著和服的日子中，有將近一半的比例是從事私人活動。可見黃對於和服的穿著應用，與一般認為臺人只有與日人來往時較常穿著的印象不同。對黃旺成而言，和服的功能同時具有兩面性，一是與臺人、日人社交場合的穿著，另一方面則為從事私人活動時的穿著，

<sup>67</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全集 2（193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1938年1月19日，頁12、192。

<sup>68</sup> 此段吳新榮日記雖然並非日治前期，但是與黃旺成穿和服所從事的活動紀錄相互參照，可以凸顯日治時期臺人穿著和服的便利性考量，因此加以引用。

功能近似於一般便服，此特點也可見於吳新榮的生活中。換句話說，黃旺成對於和服的需求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作為社交場合的服裝，具有社會需求性質；二是作為日常便服穿用，具有生活的基本需求性質。因此，和服同時具有社會身分的象徵意涵，與日常生活的實用價值。

#### 四、性質轉換的臺灣服

清代臺民穿的清制服裝是傳自中國，男性服裝主要是對襟式短上衣、大襟式長袍馬褂、長褲、碗帽與布鞋等，女性服裝主要是大襟式上衣，以及相配的裙、褲。<sup>69</sup> 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後，這些清代以來的服裝因為要與洋服、和服區分，開始有「臺灣服」、「臺灣衫」、「本島服」、「灣服」等名稱出現。

自從 1910 年代洋服開始在臺灣男性消費市場逐漸流行後，男性穿著臺灣服的機會日漸減少；<sup>70</sup> 然而其並未被淘汰，仍會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不同的是臺灣服從各種公開場合與私人活動的穿著，變成特定場合的象徵性穿著。

在黃旺成的日記中，可以發現在洋服、和服與文官制服進入其生活之前，長衫（即長袍）是最主要的穿著。1912 年，不論是去學校、到店裡或是在家中，黃旺成時常穿著長衫，或是加上馬褂，但此時黃也開始認為長衫並不好看（可笑しき長衫）。<sup>71</sup> 1913 年，制服與和服開始出現在黃旺成的生活後，有關長衫的紀錄剩下 2 日，1 次是散步時，另 1 次是回村家時。1914 年時也僅有 3 次，到校、返家，及參加同窗會時。1915 年則是整年日記都沒有提到長衫。但是長袍馬褂並沒有在此後就完全退流行，從表六自《黃旺成先生日記》揀選長衫紀錄的統計表格，可以清楚地見到長衫在黃生活中的轉變。

可以見到 1916 年之後，黃旺成穿長衫出現的次數逐漸增加，且其轉而成為特殊場合的穿著。例如 1916 年 3 月 1 日晚間，黃與胡桂林一起前往新竹俱樂部

<sup>69</sup> 華梅，《服飾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 308-311。

<sup>70</sup> 從許多圖像材料中，明顯可見穿著洋服的臺灣男性快速增加，穿著臺灣服的男性則相對減少。穿臺灣服者多為年紀較大的長輩，年輕男性的服裝大多是洋服。詳可參見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糅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頁 90-104。

<sup>71</sup> 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 年 1 月 2 日，頁 4-5。

表六 黃旺成穿著長衫與場合（1912-1921年）

年度	衣裝	場合	地點	次數	屬性
1912	長衫	到校	學校	5	學務
	長衫	到店	到店	1	私人活動
	長衫	不明	—	1	—
1913	長衫	散步	—	1	私人活動
	長衫	回村家	—	1	私人活動
1914	長衫、背心	同窗會	學校	1	臺人社交
	長衣	從值班室回家	回家	1	私人活動
1915	—	—	—	0	—
1916	長衫	俱樂部聽精神講演	學校、俱樂部	1	公共事務
	長衫	到校值班	學校	1	學務
	長衫	家中	家中	1	私人活動
1917	淺長衫	家中與友閒談	家中	1	私人活動
	臺灣服	看夜學	北門外	1	學務
	長衫	夜穿長衫	家中	1	私人活動
1919	長衫	家中	家中	1	私人活動
	長衫	拜壽	泉興	1	臺人社交
	長袍馬褂	祭孔	學校	1	公共事務
1921	香港新調長袍馬褂 (唐人衣長衫)	訪署長+樂舞台	署長家、新竹樂舞台	1	日、臺社交
	香港新調袍掛	訪友(年初二)	多位友人家	1	臺人社交
	淺長衫	父親葬禮	家中	2	臺人社交
	冬衣臺灣服	冬衣臺灣服	—	1	私人活動
	新製長袍	東洋拓殖看報紙	東洋拓殖會社	1	私人活動
	長袍馬褂	與東家接吉原坦藏	車站	1	日人社交

資料來源：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八）》。

表七 黃旺成穿著長衫出席場合之次數統計表

屬性	臺人社交	日人社交	日、臺人社交	公共事務	學務	私人活動	不明	總計
次數	5	1	1	2	7	9	2	27

資料來源：整理自上表六。

聆聽澄添氏的精神演講。<sup>72</sup> 1919年10月11日穿長袍馬褂到泉興拜壽，10月20日再穿著長衫馬褂出席祭孔大典。<sup>73</sup> 1921年黃還添購新的香港製長袍馬褂，2月9日（新年初二）黃旺成就穿著新袍掛外出拜訪友人，前往成記商號、李良弼及

<sup>72</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五）》，1916年3月1日，頁41。

<sup>73</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七）》，1919年10月11日、10月20日，頁228、234。

張麟書家，張式穀、曾瑞堯也在張麟書家，大家一起談天、吃年糕。<sup>74</sup> 4月中穿淺長衫則是在父親的喪禮。<sup>75</sup> 同年另有2次穿長袍馬褂的社交場合，分別是1月16日出訪署長、11月6日前往接待吉原坦藏，都是拜訪或接待日人。<sup>76</sup> 另有1次是1916年3月17日，晚上穿長衫到學校值班。<sup>77</sup> 由此可以看出，1916年後黃旺成穿長袍的場合，除了2次與日人交往和1次晚上到校值班外，其它5次是聽講演、拜壽、拜年、祭孔及喪禮，皆是屬於文化性質的場合，且多具有濃厚的傳統氛圍。

總括來看，在1912-1915年間，有關長衫的7次紀錄中，4次是私人活動，1次是與臺人的社交場合，1次是前往學校。接下來的1916、1917、1919、1921的4年間，15次穿長衫的日子中，6次是私人活動，9次是公開場合。這9次公開場合的活動裡，有5次是文化與傳統性質濃厚的事務。換句話說，在1910年代前半期，黃旺成多於從事私人活動時穿著長衫，此時臺灣服的性質較趨近常服；1910年代後半期，長衫成為較特殊場合中的穿著，尤其是在具有文化、傳統性質的場合，可以說是民間社會的禮服。

張麗俊方面，《水竹居主人日記》中關於服裝的紀錄甚少，但是從《水竹居主人日記》所附的照片來看，張也是長袍馬褂的愛用者。1914年1月29日，張家壽婚式的家族紀念照片中（圖三），中排右四的張麗俊便穿著長袍馬褂。而後1928年的個人照和1932年11月在妻子何燕的喪禮中，張麗俊也是穿著長袍馬褂（圖四、圖五）。另外可以注意的是照片中服裝的多元性，圖三中共有6位成年男性，包括張麗俊有4位穿著長袍馬褂，1位穿西洋詰襟與皮鞋，1位穿和服，女性則全為臺灣服，孩童們的服裝則是洋式、臺式都有。此外可以看到張麗俊與其右方兩位男性，3人雖然穿長袍馬褂，但全已剪辮，為西式短髮，且3人均拿洋式中折帽。圖五張麗俊也是身穿長袍馬褂，腳穿洋式皮鞋。因此，在同一個時空場景，樣式不同的洋服、和服、臺灣服不僅會同時出現，還可能混合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由此可以瞭解在當時臺灣服飾文化演進、變遷的過程中，新與舊、傳

<sup>74</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1921年2月9日，頁60。

<sup>75</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1921年4月16、17日，頁140。

<sup>76</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1921年1月16日、11月6日，頁28、341。

<sup>77</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五）》，1916年3月17日，頁51-52。

統與現代、外來與在地這些看似相互對立的元素，實際上彼此間卻不是衝突，而是相互混雜，融合成一幅多元多樣的豐富景象。

臺灣服除了具有傳統與文化的性質，也顯現在地性格。「臺灣服」一詞最早見於日治初期，<sup>78</sup> 乃是來臺日人用來稱呼臺人在日人來臺前就已穿著的服裝，以之與日人帶入的洋服、和服作區別。黃旺成自 1917 年，也開始使用「臺灣服」這一詞。該年 9 月 13 日，「本夜以臺灣服往。」<sup>79</sup> 9 月 17 日，「換臺灣服，登校寫學校新聞。」<sup>80</sup> 可知臺人也以臺灣服稱呼此服，這套原本來自中國的服裝在名稱上出現了在地化的現象。



圖三 張麗俊家族壽婚式寫真照片（1914 年 1 月 29 日）

說明：張麗俊（中排右四）身穿長袍馬褂，包括張的 3 位男性皆手拿洋式中折帽。當天是張麗俊母親的 81 歲大壽，其三男世藩亦於該日娶妻，因此稱為「壽婚式」。

圖片來源：張正魁先生提供

<sup>78</sup> 「……臺灣服を脱ぎ替にて窮屈な洋服に肩を凝らすでもあるまい……」參見〈臺灣の半可通〉，《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11 月 10 日，第 5 版。

<sup>79</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六）》，1917 年 9 月 13 日，頁 173。

<sup>80</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六）》，1917 年 9 月 17 日，頁 176。



圖四 張麗俊個人照（1928年）

說明：張麗俊穿長袍馬褂之個人照。

圖片來源：張正魁先生提供



圖五 張麗俊攝於妻何燕喪壇照片（1932年）

說明：張麗俊身著長袍馬褂，腳穿洋式皮鞋。

圖片來源：張正魁先生提供

除了名稱在地化，臺灣服實質上也出現在地化的傾向。黃旺成在 1925 年 3 月 27 日的日記中，記錄當天他吃過午飯後，就「用平常的衣服，現了臺灣人本來的面目。」<sup>81</sup> 其所說「平常的衣服」，即是臺灣服。以往黃寫到臺灣服時，多僅寫長衫、短衣、本地服或臺灣服，並無其它描述。這天卻用略帶強硬的語氣，說明用這套「平常的衣服」，可以用來表現「臺灣人的本來面目」，而這平常的衣服，就是臺灣服。究其原因，這天上午黃旺成先看了從臺灣立場發聲的《臺灣民報》，對其中所談的內容頗為贊同。下午又在圖書館看到《經世日報》，不滿其強烈攻擊臺灣文化協會的作為。兩相激盪下，促使黃湧現其臺灣立場，而以臺灣服作為臺人的代表。

同樣以臺灣服作為臺人立場代表者，包括林獻堂。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中對於服裝的紀錄雖然不多，但是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寫真照片留存頗多，因此可結合日記描述與當日紀念寫真，共同觀察林所穿服裝與出入場合的關聯。筆者以《臺灣霧峯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1897-1947）》的照片配合《灌園先生日記》中的記述，相互對照觀察整理成表八和表九。<sup>82</sup>

表八 《灌園先生日記》與《臺灣霧峯林家留真集》  
林獻堂穿著紀錄表（1929-1937 年）

時間	衣裝	場合	地點	屬性	備註
1929.02.23.	長袍馬褂	朋友聚餐	臺中博愛醫院	臺人社交	博愛醫院受宴臣之招待
1929.05.04.	長袍	櫟社第三回壽椿會	霧峰林家	臺人社交	
1931.04.26.	長袍馬褂	櫟社三十週年大會	吳子瑜東山別墅	臺人社交	
1932.01.03.	長袍馬褂	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第一回社員懇親會	臺中本社	臺人社交	
1933.05.13.	長袍	觀畫家顏水龍作品展	臺中圖書館	私人活動	偶遇友人之合照（圖八）
1933.08.12.	長袍	一新會第一回夏季講習會	霧峰林家	公眾事務（民）	（圖六）
1933.11.07.	西裝、中折帽	坑口農事自治村發會式	臺中霧峰坑口村	公眾事務（民）	日、臺人皆有

<sup>81</sup>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25 年 3 月 27 日，未出版手稿。

<sup>82</sup>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峯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1897-1947）》，（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1934.01.03.	長袍馬褂	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第三回社員懇親會	臺中本社	臺人社交	(圖七)
1934.03.19.	長袍	一新會二週年祝賀會	霧峰林家下厝大花廳內庭	公眾事務(民)	
1934.10.28.	西裝、中折帽	飛行士楊清溪歡迎會	臺中練兵場	公眾事務(官)	拿日本小旗幟
1935.04.14.	長袍、布鞋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理事會	臺中本部	公眾事務(民)	僅林一人穿中式服，餘皆西服
1935.05.26.	西裝	後藤泰彥邀宴	臺中醉月樓	臺、日人社交	大月京平穿和服、後藤穿西裝，作陪女性穿旗袍
1935.12.03	長袍馬褂	櫟社第七回壽椿會	東山吳子瑜宅	臺人社交	
1937.01.05.	西裝	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第六回社員懇親會	臺中本社	臺人社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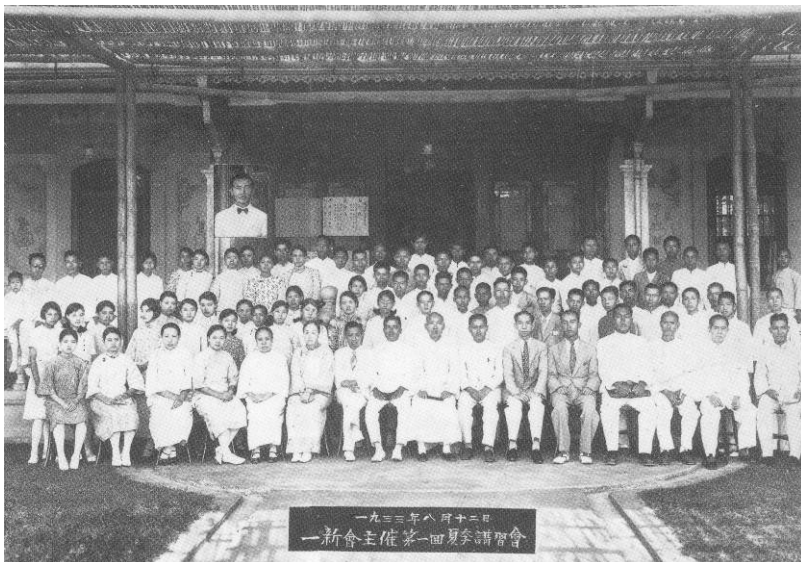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頁 64、132；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四）》，頁 135、365；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頁 5；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 197、311、428；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 4、108、410；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八）》，頁 131、184、427；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頁 7；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峯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1897-1947）》。

表九 林獻堂穿著服裝與出席場合之次數統計

屬性	臺人社交	臺、日人社交	公眾事務(民)	公眾事務(官)	私人活動	總計
長袍	6	0	3	0	1	10
西裝	1	1	1	1	0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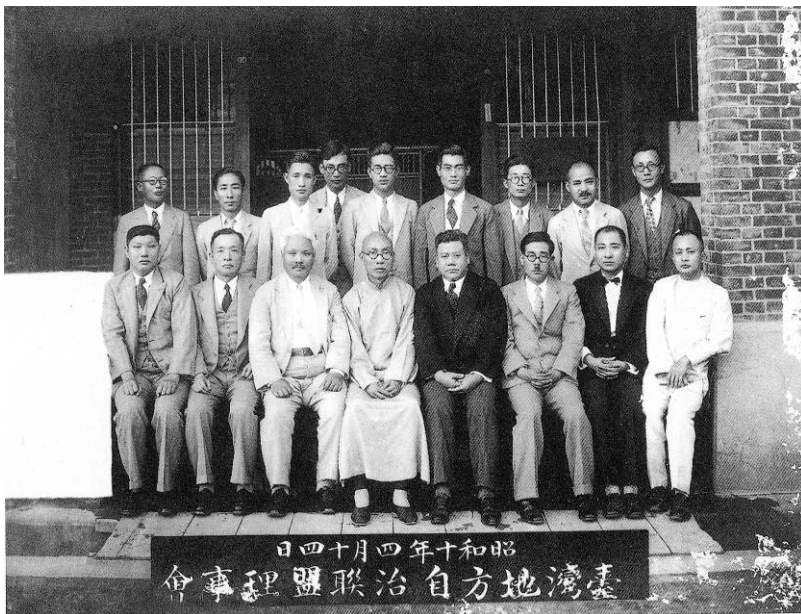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整理自表八。

由表八、表九林獻堂的穿著紀錄來看，14 次中有 10 次是穿長袍馬褂，4 次是穿西裝。前已述及，1910 年代以後，洋服開始大為風行，男性在較為正式的場合多穿著西裝。雖然林獻堂也購置西裝洋服，但是卻較常穿著長袍馬褂出席各種社交場合，不論是歷屆櫟社詩會、講習會（圖六）、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理事會（圖七）等公眾場合，或是看畫展（圖八）、與親友聚餐這類的私人行程，即使周遭的友人都已換上全套的西裝出席，僅他穿著長袍馬褂，也不為所動，依然堅持臺式服裝。



圖六 林獻堂參加一新會第一回夏季講習會（1933年8月12日）

說明：前排中坐者（右八）為林獻堂。僅林獻堂1人穿長袍馬褂，其他男性皆穿著洋式的西裝或詰襟。  
圖片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書前照片（不著頁數）。



圖七 林獻堂參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理事會（1935年4月14日）

說明：僅林獻堂1人著長袍馬褂（前排左四），其他人皆穿西裝。  
圖片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八）》，書前照片（不著頁數）。



圖八 林獻堂於臺中圖書館觀看顏水龍畫展（1933年5月13日）

說明：男性中僅林獻堂穿長袍馬褂與布鞋（前排右三），其他人皆著洋服與皮鞋。  
圖片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書前照片（不著頁數）。

林獻堂對於長袍馬褂的堅持，或許可從他的政治與文化立場上窺見端倪。在政治方面，林獻堂於日治時期領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日本政府周旋，且對於日本政府的施政措施與文化宣傳表示不滿。<sup>83</sup> 在文化方面，林獻堂相當注重漢文化的保存，大力支持櫟社。<sup>84</sup> 在這兩方面的一推一拉之下，長袍馬褂成為林獻堂出席公開場合最常見的穿著，也成為其立場的代表。換言之，林獻堂的長袍馬褂，一方面可視為代表臺灣（對日本政府爭取自決權益）的立場，另一方面是象徵對漢文化的堅持。簡言之，林獻堂的臺灣服具有在地性與文化性的象徵特質。

從以上的日記與圖像材料來看，雖然長衫面臨洋服、和服與文官制服的挑

<sup>83</sup>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002年5月），頁293-295；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日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年6月），頁11。

<sup>84</sup>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年12月），頁27-65。

戰，不如以往頻繁出現，卻反而成為文化的、傳統的、在地的代表服裝。對黃旺成的生活而言，長袍式的臺灣服從一般場合的常服，轉變為具有象徵意義的符碼，是代表傳統與文化的禮服。張麗俊在傳統的儀式場合，也是穿著長袍馬褂出席。林獻堂在公開場合中以長袍馬褂為主的穿著，具有代表臺灣立場的意涵。黃旺成更直說穿臺灣服可以表現「臺灣人的本來面目」。因此，臺民對臺灣服作為常服、便服的日常生活需求性，以及一般社交場合的社會需求性雖然降低，但並沒有被淘汰。洋服、和服的出現，雖然使臺灣服的使用場合因面臨競爭而縮限，但也因有可與臺灣服相互比較的服裝，讓臺灣服代表在地、傳統、文化等的特質得以凸顯。換句話說，在歷史因素的作用下，原本在地的臺式長袍衣裝，不僅在名稱上變成臺灣服，更在實質內涵上成為臺灣的代表。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雖然臺人穿著臺灣服的頻率降低，臺灣服常被年輕一代認為是已經退流行的服裝。但是部分來臺日人反而認為穿臺灣服易於活動，且價廉經濟，因而非常喜愛。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不時可以見到在臺日人因感臺灣服的經濟與便利而喜愛穿用。例如景尾派出所某巡查認為臺灣服是最適合閒暇、家居時的穿著，購置了多件在下班後穿用。<sup>85</sup> 另外包括來臺的日本年輕士官、商社店員等都會購買臺灣服，臺灣服似乎成為部分日人間的一股流行。<sup>86</sup> 不同的是，對於臺人而言，臺灣服成為傳統、文化場合中的正式禮服；但是對於來臺日人而言，臺灣服卻成為一般休閒穿用的常服。由此，不只臺人會模仿日人的服裝，日人也會學習臺人的服裝。這顯示出服裝文化的發展並非僅是上而下的擴散（由統治者傳向被統治者），而也有由下而上傳衍的現象，或是朝其它方向發展的可能。<sup>87</sup>

<sup>85</sup> 〈雲白梅香〉，《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2月3日，第5版。

<sup>86</sup> 〈基隆內地人喜穿臺服〉，《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2日，日刊第4版；〈北港·灣服流行〉，《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6日，夕刊第4版。

<sup>87</sup> 西方消費相關研究者如 Neil McKendrick 提出「社會仿效」(social emulation) 的論點，指出社會下階層者會模仿上階層者的行為與品味。但是 Ann Bermingham 對 McKendrick 的「社會仿效論」提出質疑，其指出仿效論是假定文化都是由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由上往下傳衍的。這種論點前提是由上往下的模式，因而無法反映文化可能朝反方向流動。例如十八世紀中期英國上層婦女的帽子是模仿擠奶女工帽子的樣款，即是文化由下往上傳衍的例證，因此文化流動的方向存在多種可能性。參見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1982); Ann Bermingham, "Introduction: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Image, Objects, Text," in Ann Bermingham and John Brewer, eds.,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1600-1800: Image, Object, Tex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1-20.

## 五、結論

關於服裝文化的既有研究，大多是由政治、經濟或潮流等大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著手。例如洪郁如結合政治與流行兩條軸線，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摩登女性與「流行政治化」的現象；<sup>88</sup> 張世瑛嘗試結合國族主義與商業、時尚的兩個角度，檢視清末中國剪辮改裝的政治、經濟、階級及性別等因素。<sup>89</sup> 人們所穿的服裝確實可視為多重象徵意涵的符碼，可由大的層面、結構去探討服裝所具有政治性、社會性、階級性及經濟性等意涵。但是服裝並不只是符碼，穿著不能全以此來解讀。例如黃旺成曾經穿著斗笠、洋服、木屐，到城裡去買皮鞋，張麗俊也會身穿長袍馬褂，又同時戴中折帽或穿西洋皮鞋。如此在同一時空、同一人身上，臺式、洋式，甚至和式等不同風格的服裝雜糅在一起的現象，就難以用符碼代表的意涵去完全理解。換句話說，符碼的象徵意涵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服裝對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也相當重要。

由此，不同於廣闊脈絡的分析，本文從記錄了生活點點滴滴的日記材料著手，觀察日治前期臺灣仕紳對於服裝的穿著與選擇。在這些真實的生活中，可以清楚見到人們對於服裝的基本日常需求。例如黃旺成穿日本式的木屐，往往只是因為臺灣氣候多雨，過去的布鞋容易潮濕，而改穿通風好、乾燥快的木屐。黃穿著和服的紀錄中，私人活動明顯多於社交場合，主要也是因為和服較寬鬆，脫穿或活動都很方便。由此明顯可見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對於服裝的選擇有一定的影響力。<sup>90</sup>

關於洋式、日式與臺灣式等不同風格服裝的發展，則可見於個人生活中服裝的穿用。透過日記的記述，可以發現男性西衣服裝的盛行起於 1910 年代的剪辮改裝風潮。自此，象徵著文明、進步的西裝、襯衫、詰襟等洋服開始頻繁地出現

<sup>88</sup> 洪郁如，〈殖民地台湾の「モダンガール」現象とファッションの政治化〉，頁 261-284。

<sup>89</sup> 張世瑛，〈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頁 7-10。

<sup>90</sup> 實際上影響服裝文化的可能因素非常多，包括經濟發展、商業宣傳、傳播媒體、官方政策、個人財力、階層地位、民間習俗（慣）、地域與族群差異等，皆會對個人服裝的選擇造成影響。惟本文是以日記材料為中心進行的討論，因此限於題旨與篇幅，較著重於個人的日常生活層面及其相關問題，無法涵括影響服裝的各方面因素。

在各種社交場合，成為社會人士交往迎來的主要服裝之一。如黃旺成常會穿著西裝參加詩會、餐宴、訪友、或是前往銀行與公家機關處理事務等。此外，另一種官方制定的洋服——文官制服，也因為黃旺成擔任教職而進入了他的生活。除了一般上課時穿著，重要典禮儀式還會再配戴肩章與長劍，制服成為官方認定的禮裝。黃在學校慶祝節日或有重要典禮時，會穿上全套的文官制服。

至於日式和服在日治前期逐漸進入臺灣仕紳的生活，符合日常生活的需要應是重要因素之一。木屐具有乾燥涼爽的特性，適合在多雨的臺灣穿用，因此常可見到黃旺成與張麗俊在雨天穿著的紀錄。和服的設計較為寬鬆，適合休閒時穿著，因此黃旺成在散步、休憩、入浴、或看醫生等私人活動時，也常會穿著。然而這與既有研究成果相對照，卻呈現不同的樣態。洪郁如對於女性服飾的研究指出，穿和服有許多禮儀和動作的規定，因此限制了和服在臺人日常生活中的流行。<sup>91</sup> 但是從男性仕紳的日記，卻常可見到和服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此差異可能來自性別、社會階層、經濟財力等因素，其間之複雜非日記材料所能解決，尚需另文再行深論。

臺灣服原本是臺人的常服、禮服與社交服，用途廣泛。但是 1910 年代開始面臨洋服與和服的競爭後，在許多場合逐漸被取代，期間雖然經過短暫的低盪，但是並未被淘汰。在黃旺成與張麗俊的生活中，可以見到自 1910 年後半期，臺灣服再度興起，出現在拜壽、祭孔及喪禮等場合。顯然此時臺灣服的日常性已經降低，而是出現在具有傳統、文化性質的特定場合。又，在林獻堂與黃旺成對於臺灣服的穿用中，可以見到長袍成為臺灣立場與文化傾向的代表，具有象徵著在地的、傳統的、文化的意涵。此外，令人玩味的是，亦有部分來臺日人喜愛穿用臺灣服，意即不僅臺人模仿日人的服裝文化，日人也會吸收臺人的服裝文化。由此可見，服裝文化傳布的方向並非單一的由上往下，也有由下往上、或是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此外，日治時期臺人服裝文化的發展也與現代性開展的議題有關。日治時期臺人對於現代性的態度，一直是相當受到關注的研究議題，研究成果有呈現出臺人對於現代文明的自主性，也有指出臺人因受制殖民體制而缺乏主動性，其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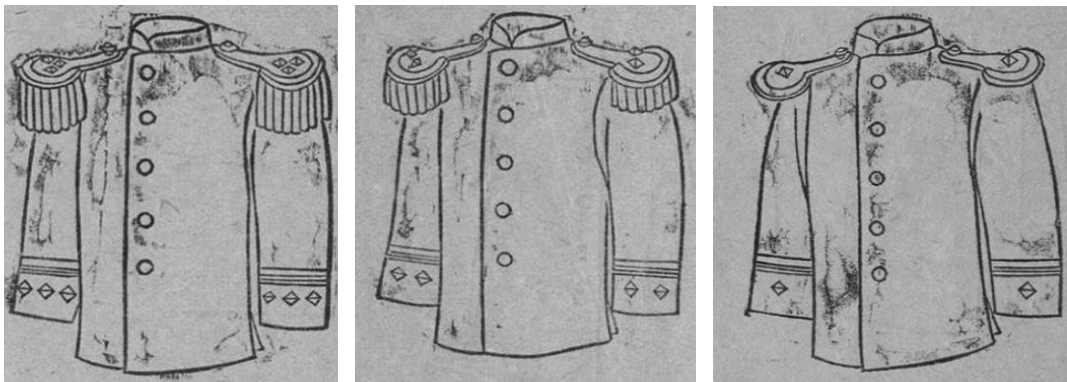
<sup>91</sup> 洪郁如，〈殖民地台灣的「モダンガール」現象とファッションの政治化〉，頁 280-281。

相當的議論性與複雜度。<sup>92</sup> 然而相對的，所謂的「傳統」，在臺人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似乎只是一種相對的存在，僅被用以對照現代性的特質與發展。事實上，從日治臺人的服裝文化來看，臺人一方面喜愛追求新穎的、代表現代的西洋服裝，另一方面卻也留著、穿著具有傳統色彩的臺灣服。而且臺灣服不僅沒有被捨棄，其象徵意義還因為新式服裝的出現而發生轉化，增強了在地的代表性與文化的象徵性。此外，臺灣服也與新式的、外來的服裝相結合，出現洋式、臺式及日式服裝糅合於一身的現象。換句話說，在透過改變服裝以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新元素和舊元素並不是競爭、取代的關係，而是呈現出互相調適、彼此融合的現象。對於服飾，臺人雖然非常「喜新」，但卻也相當「戀舊」。

---

<sup>92</sup> 詳可參見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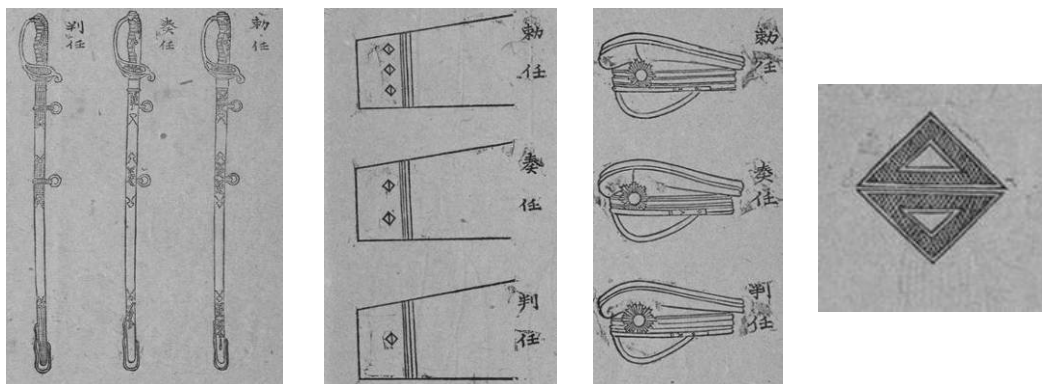
### 附錄：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頒布之文官制服



圖九 勅任官、奏任官、判任官之官服

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勅任官、奏任官、及判任官之官服。勅任官服的肩章與袖章有3個台字金章，奏任官是2個，判任官則是1個。勅任官的肩章附有3吋3分長的流蘇金穗，奏任官的為2吋，判任官的則無。

圖片來源：內務大臣侯爵西鄉從道，〈臺灣總督府文官服制〉，《臺灣總督府府報》475（1899年3月10日），頁16-17。



圖十 文官制服之佩劍、袖口、制帽與台字金章

說明：勅任官佩劍有2朵帶葉櫻花，奏任官1朵，判任官則無。勅任官袖章有3個台字金章，奏任官2個，判任官1個。勅任官制帽有3條金線，奏任官2條，判任官1條。右側為文官服袖口和肩章上的「台」字型的金章。

圖片來源：內務大臣侯爵西鄉從道，〈臺灣總督府文官服制〉，《臺灣總督府府報》475（1899年3月10日），頁17-19。



## 引用書目

《臺灣總督府府報》

《實業之臺灣》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黃旺成個人照〉，《黃旺成文書》，檔號：T0765\_000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黃旺成與亂彈會成員合影〉，《黃旺成文書》，檔號：T0765\_001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手稿），1925年，未出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江馬務

1973 《結髮化粧小間物履物史》。東京：雄山閣。

吳文星

2008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吳奇浩

2008 〈清代臺灣漢人服飾之消費與生產〉，《臺灣文獻》59(3): 221-258。

2012 〈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

2007 《吳新榮日記全集2（193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林華東

1991 〈話說木屐〉，《故宮文物月刊》9(6): 116-119。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0-2010 《灌園先生日記（一~十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岡本真希子

2008 《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

孟悅

2008 〈前言／什麼是「物」及其文化：關於物質文化的斷想〉，收於孟悅、羅鋼主編，《物質文化讀本》，頁1-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夏士敏

1994 〈近代婦女日常服裝演變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郁如

2009 〈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臺灣女性的服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7: 31-66。

2010 〈殖民地台湾の「モダンガール」現象とファッションの政治化〉，收於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タニ・E・バーロウ編，《モダンガールと植民地的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帝国・資本・ジェンダー》，頁261-284。東京：岩波書店。

華 梅

2001 《服飾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張世瑛

2005 〈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

2000-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臺中：臺中縣文化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

1998 〈林獻堂著《環球日記》研究〉，《臺灣文獻》49(2): 1-33。

2002 〈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 259-296。

2006 〈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 27-65。

許雪姬（總策畫）

2004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連 橫

1962(1920)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

2006 《「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游鑑明

1988 《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菅武雄

1938 《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新竹：自刊本。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2008-2012 《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美娥

2004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總督府（編纂）

1913-1917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二~六年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蔡振豐等

1959 《苑裏志》，臺灣文獻叢刊第4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鄭鵬雲、曾逢辰（編）

1959 《新竹縣志初稿》，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賴志彰（編撰）

1989 《臺灣霧峯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1897-1947）》。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蘇旭瑛

1993 〈臺灣閩族婦女傳統服裝的設計與變化〉。臺北：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

Bermingham, Ann

- 1995 "Introduction: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Image, Objects, Text." In Ann Bermingham and John Brewer, eds.,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1600-1800: Image, Object, Text*, pp. 1-2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McKendrick, Neil,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 1982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 Clothing Culture of Gentry in Early Colonial Taiwan

Chi-hao Wu

### ABSTRACT

Contrary to most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used newspaper or investigation reports to examin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lothing culture of Taiwanese gentry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 using their diaries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s. While newspaper or investigation reports indeed contained descriptions on a wide spectrum of phenomena, diaries allowed a closer look at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 with more realistic portrayal. From their day-to-day depictions, one can know better their life, the people surrounding them, their world views, emotions and values.

The dairi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r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Diary of Chang Li-jun*, and *Diary of Ng Ong-seng*. As mentioned in these diaries, western men's wear had been gaining popularity after the cut braided wave of the 1910s. Since then, suits and shirts were more frequently worn at many social occasions,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attire for social fun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Japanese kimono also got gradually into the lives of the Taiwanese gentry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ecause it conformed to the needs of Taiwanese daily living.

Originally, Taiwanese style of clothing was part of the daily wear and attire for special and social occasions. Beginning from the 1910s, it faced intense competition from western wear and was gradually replaced, though not totally taken over, by foreign fashion. As seen in the life of Ng Ong-seng and Chang Li-jun, Taiwanese style of clothing re-emerg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10s and was seen at birthday celebrations, memorial ceremonies for Confucius, funerals and other occasions. Obviously, Taiwanese attire was worn at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In particular, as seen in how Lin Hsien-t'ang and Ng Ong-seng dressed themselves, robe had become a symbol of their being Taiwanese and their cultural inclination, thus acquiring a special local,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here existed a multi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the mix-and-match of Taiwanese clothing, western fashion and the Japanese kimono. In view of the above, Taiwanese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seemed to embrace new fashion from overseas while cherishing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clothing.

**Keywords:** Diary, Clothing, History of Clothes, Suit, Western Clothes, Kimono,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ocio-Culture